

破解“内卷”的安庆门径

章宪法

教育“内卷”由来已久,科举时代尤为激烈。在明朝存续的276年间,89科计录取进士24586人,平均每科(三年一科)276人,这在总人口过亿的国度,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。

求进难度如此,一个家族五代以内如有两个子弟考中进士,便可称之为显赫的“科举世家”。科举世家又面临着新崛起家族的竞争,故而96%的科举世家无法超过三代。

有没有成功解决科举“内卷”问题的家族呢?《结社的艺术》选择的样本是桐城桂林方氏。该家族创造了两大科举奇迹:打破了科举世家不过三代的“铁律”,科举之隆延续了明清两朝,直到科举制度终结;明清两朝共涌现进士31人,一个家族匹敌一个平均水平的州、县。

桐城桂林方氏应对科举“内卷”的秘诀,即是“结社的艺术”。方以智之父方孔炤建有“泽园”,为子弟读书之所,后演变为“泽园永兴社”(简称

“泽社”)。泽社确切的成立时间未见史料记载,《结社的艺术》将之推定在明天启年间。泽社具有文人社团性质,方氏家族诸多文学名家的出现,乃至其后桐城文派风行中国文坛二百余年,都与泽社存有一定的渊源关系。但诗文切磋对泽社来说只是表象的,最直接的功利目标则是社友课读其间,以应举业,且社友存在明显的家族属性,以方以智为核心。

详尽的泽社成员名单今不可考,留有文字记录的见有方以智、方文、吴道凝、孙临、周歧与钱澄之六人。这六人看起来分属五个家族,其实都与方以智及其家族密切

相关,或为本族子弟,或为姻亲、世戚,这也是泽社的家族属性所在。六人中除方以智妹夫孙临弃文从武外,其他五人皆获得科举功名。如果不是遭遇王朝更迭,泽社成员的科举成功率将是100%。

极度内卷的科举难题,泽社因何而破解?明代科举,经义贯穿了科考始终,得经义者得科考。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周易》《春秋》为“五经”,根据科举制度的规定,考生可以任选一经作为自己科考的“本经”,类似今天的选考科目。选考科目的优势,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终的科举结果。

以现存的科举史料看,方以智及其伯祖方大美、祖父方大镇、父亲方孔炤,皆以“易”为“本经”,通过了会试、殿试成为进士。《易》虽非桐城地域专经,却是桐城桂林方氏的“家族专经”,也是这一家族家学的学问支柱。不仅如此,授业泽社的白瑜、王宣两位先生,同样以治易闻名其时。由此可见,泽社是以其学问强项赢得科举优势的。

旧桐城地域上,陈洲刘氏与桂林方氏的人口规模都在10万以上,但陈洲刘氏仅有1人考中进士。“桐城文派三祖”之一的刘大櫆,蹭蹭科场近五十年,最好的科考成绩只是中了乡试副榜。刘大櫆可谓才华横溢,在高度内卷的科举面前仍旧败北。两大家族的科举成果天差地别,就在于后者没有相应的家族结社,也没有形成家族的家学支柱。拥有核心竞争力,桐城桂林方氏对教育内卷问题的解决,也就有了现实的镜鉴意义。

汪德钺上书“二朱”

何诚斌

汪德钺对于朱筠研究“经学”,同样关注,但他有着不同于别人的独立观察和审视,给予了建设性的看法。他觉得政府官员、尤其是文官不能泡在书斋里皓首穷经,不可“徒为训诂章句之业”,而应将学问之研究与实践活动相结合,甚至要担负起“筹国家,定大礼,制大政”的重任——用现在的话说,知识精英要参与“顶端设计”。汪德钺出生于1748年,比朱筠小19岁,算是晚辈,他给朱筠写信,直接亮明观点,认为知识分子的学术路径和思想行为与国运兴衰、国势强弱密切相关。

汪德钺对朱筠说:“德钺窃以为经学之盛衰,与人才、国运相表里。三代以前,靡论已。两汉崇尚经术,名儒辈出,一时公卿大臣,迄郡守、亲民之小吏,类多能疏通博古,达诸治绩。筹国家,定大礼,制大政,事或灾异天变,类多能条其本末,析其异同,折其是非、成败、利钝,明白晓畅,可法可传;周敢率尔臆断,侮背旧典。”他反对空谈,“晋魏以还,竞尚清谈,老庄仙佛,交蠹其间,其余六经,土苴糟粕而已。”他对于文化繁荣而军事力量不强的宋朝,有较为辩证的见解,一方面:“宋大儒挺生,爬疏前经奥旨,一时附而和者载在史册,不可胜书。”另一方面:“国势虽弱,而支持数百年不败,以经学昌明,人知大义,贤士大夫维持推挽之力居多也。”

最后,汪德钺掷地有声地说:“二千余年间,人才、国运之盛衰,与经学之晦明迭为升降,盖历历不诬若此。”“斯盖下以作育天下之人才,而上以培国家之气脉。”(《上朱竹君先生书》)可是,当时清朝已显现衰颓之势,训诂、考订之风强劲,名为“汉学”(经学),却没有大汉雄风;学术著作不少,可多是压抑新思维和脱离社会的罗列旧说,甚至一些人还在维护礼制,下级见上级要行跪拜礼,不愿用拱手礼替代。这不是丧失廉耻吗?

有人竟然问:“长揖之与半跪,何关荣辱?易半跪而为长揖,何裨政体?”汪德钺回答:“今长揖之与半跪,其相去有霄壤之隔,何谓无关荣辱?易半跪而为长揖,即可肃上下之观瞻,何谓无裨政体?”(《上大宗伯纪晓岚师书》)

再来看汪德钺写给朱筠的弟弟朱珪的书信,仍然是“有话直说”的坦诚,秉持“有其人、有其时,而不言则为失时、为失人,是以不能默默”的理念。不过朱珪的性格好,能虚心接受。朱珪在乾隆朝当过编修、按察使、布政使、学政、总督等,还做过嘉庆的老师,于乾隆五十五年(1790)秋,出任安徽巡抚。据《清史稿》记载,他在安徽抗洪救灾表现突出:“皖北水灾,驰驿往赈,携仆数人,与村民同舟渡,赈宿州、泗州、碭山、灵璧、五河、盱眙余灾,轻者贷以粮种。筑决堤,展春赈,并躬莅其事,民无流亡。”后来,嘉庆皇帝对他的评价很高:“持躬正直,砥节清廉,经术淹通,器宇醇厚。”(《仁宗赐奠朱文正文》)还有挽诗二句:“半生惟独宿,一世不言钱。”

汪德钺在《上冢宰朱石君先生书》中,对比自己年长17岁、且官位比自己高得多的朱珪说了不少近乎“教导”的话,什么大家都称颂现在是盛世,然而,“以大《易》占之,今日之象,其卦为‘丰’,丰之时最可喜,亦最可虞,‘日中’之戒,大约以保泰持盈为急务。”后来历史的走向,正如汪德钺生前所担忧的一样,中国日趋衰败而落后于西方列强。他的老师纪晓岚也曾承认中国学者自明代以来,受八股文局限和“心学”影响,“即尽一生之能事,故征实之学全荒也。”可是,纪公对于西学,虽发现“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要,以明体达用为功”,但认为跟中国儒学相比,西学“所格之物,皆器数之末;所穷之理,又支离怪诞不可诘。”(《阅微草堂笔记》)纪晓岚的文化自信掩盖了对于西方科学、法学推动社会文明进程这一事实的无知,当然,因囿于当时环境无法

对西方文化全面了解、深入研究。

汪德钺对朱珪说的一番话,现在看来不仅有历史价值,还有现实意义,如关于财富,他说:“席人物之殷富者,每易奢,药奢之术,惟在省节简约,而持之以俭。”“则富藏于民,而不患其匮乏矣。”如关于用人,他说:“夫利口便捷之人进,则持重敦厚,培养元气之人黜矣;奔竞好利之人得志,则廉耻之道丧,而剥损及于闾阎矣。”如关于廉政,他说:“朝廷不能养百官之廉,其病终及于国家。”如关于民政,他说:“亲民之吏,莫切于州县;州县者,治乱之根本也。今各布政司所辖,无地无亏空,其由来者渐矣。姑以安徽计之,繁剧之县多至十余万,以数千金计者,殆仅见耳。”最后,他希望朱珪“浑然元气,足以培养生人之命脉,而又神明内朗,于天下利病得失烛照而著次之。”

汪德钺为什么要对前辈、长官、大学者说这么多火辣辣的话呢?或许,一则他们人品可靠,说实话他们不会见怪。汪德钺研究《周易》颇有心得,如“履者,礼也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,是以有动作威仪之则,能者养之以福,不能者败以取祸,故曰视履考祥。”“大过,过涉灭顶,木在泽下,盖舟沉于水之象,而中孚,利涉大川,木在泽上也。”(《周易偶记》)故对“二朱”上书直言利害,或无咎吧。

二则他们影响力,汪德钺作为“高洁特立之士”本应有强烈的忧患意识,必须与家乡安徽有缘的“二朱”把话说重些。汪德钺先后任庶吉士、礼部员外郎,虽不是谏官,但他认为,“选为吉士,区区犬马之恋,岂能无动于中?”(《上冢宰朱石君先生书》)。故而“褻秋毫之善,贬纤芥之恶”,“记人之善,忘人之过”,“拯人心沉溺者”(《四一居士文抄·纪晓岚八十序》),不仅是为官责任、为人品德,更是士大夫及读书人的理想追求。



清代怀宁进士汪德钺(字锐斋),反对官场跪拜之礼,他说:“夫拜跪,细事耳,而所关甚巨。自古宗社之巩固,由士大夫之有气节,气节之能植,由士大夫之识廉耻。”(《上大宗伯纪晓岚师书》)

从清代缪荃孙编辑的《艺风堂杂钞》收录的三篇汪德钺的书信来看,他不仅坚决反对跪拜,还反对脱离实际的乾嘉考据之风,等等。他除了对纪师上书直言无讳,还对“二朱”的上书亦口出狂言(他明示对方“狂夫之言,圣人择焉”)。“二朱”,即朱筠(字竹君)和朱珪(字石君)。这两位萧山兄弟在乾嘉时期都有一定的名望,尤其在安庆地区颇具影响。

朱筠治经学,宗汉儒,见识广博,出入诸史百家,皆考证是非同异,又精通金石文字之学,当过《四库全书》的纂修官。乾隆三十六年秋(1771),朱筠提督安徽学政,成为安庆文化圈的中心人物。他在“学政”这个位置上,做了一些有利于文化强省建设的事,如重刊许慎《说文解字》,广布学宫,命诸生学习,等等。以至于他在安庆留下的口碑,比前任和后任都要好。

姚鼐对朱筠的评价不错:“(朱筠)称述人善,惟恐不至;即有过,辄复掩之。后进之士,多因以得名。室中自晨至夕未尝无客,与客饮酒谈笑穷日夜,而博学强识不衰,时于其间属文。其文才气奇纵,于义理、事物、情态无不备,所欲言者无不尽,尤喜小学。为学政时,遇诸生贤者,与言论若同辈,劝人为学先识字,语意谆勤。去而人爱思之。”(《朱竹君先生别传》)意思是说,朱筠在安庆广交朋友,培养了一批才俊,在教育学生方面,认为读书通经的基础是小学,强调文字训诂的重要性,一定要将功底打坚实。

甚者,认为安庆之所以学风好与朱筠当了几年安徽学政有关。洪亮吉在《书朱学士遗事》中说:“先生去任后二十年中,安徽八府有能通声音、训诂,及讲求经史实学者,类皆先生视学时所拔擢。夫学政之能举其职者,不过三年以内,士子率教及文风丕变而已。而先生之课士,其效乃见于十年二十年以后若此。”